

在第二轮《临潼区志》 编纂工作上的讲话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刘培仓

同志们：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第二轮《临潼区志》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二轮《临潼区志》的编修工作有了实质性的启动。在此，我代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地方志办公室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庆贺，向多年来热心支持地方志工作的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涉及面广，内容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已经绵延 2000 多年。自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把修志当成国家行为，作为官职官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古代地方志的利用和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在战争年代，

每解放一个县城，毛泽东同志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来看。1958 年 3 月，在成都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不仅调阅了《四川通志》、《灌县志》、《蜀本纪》等四川方志，还辑选了《华阳国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并倡议全国各地都要编修地方志。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就编修地方志进行了专门地安排部署，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1958 年 8 月，周恩来同志指示，要系统地整理地方志，把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年鉴是西方的“舶来品”，如今已成为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就提出要编修年鉴，与国际接轨。1979 年 10 月，他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时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 年 5 月 26 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地方志编

●特 载●

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曾指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在 2008 年 11 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作了重要讲话，她指出：“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受到冲击和挑战，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日益成为时代发展的紧迫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还要有文化魅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通报了全国的修志情况，宣布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完成，第

二轮修志工作已全面展开。

我党省委、省政府也一直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在上世纪末全省第一轮新编地方志书基本完成之际，省政府办公厅即于 1999 年印发了《陕西省地方志工作 12 年规划纲要(1999-2010 年)》(陕政办发 [1999]26 号)；2000 年 11 月 24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续修地方志工作的通知》(陕政办发[2000]131 号)，安排部署二轮修志工作；2006 年 8 月，省委省政府两个办公厅联合下发《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方案》(陕办发[2006]27 号)，标志着全省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有计划、有部署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从 2006 年至今，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地方志工作会议就有四次。每次会议省政府领导都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每次会议都请各市人民政府和省级厅局的负责同志到会，使各级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环境越来越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那些对地方志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拖拉的单位，省政府的主管领导亲自上门督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省第一轮修志与全国各省市的步伐大体一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轮省志共计划编纂 79 卷 89 册。截至 2008 年 12 月,经过多方努力,最后一部省志通过终审,全省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画上了句号,并全面转轨到二轮修志上来。全省二轮修志工作虽起步较早,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造成进度缓慢。近两年来有了新的改观,目前市、县两级 117 个承编单位,有方案和篇目的单位已占总数的 87.2%。去年二轮修志取得了零的突破,重修《渭南市志》第一卷和《佳县志》相继出版。省志方面已有 40%左右的单位开始启动,工作进展最快的是省知识产权局,他们承编的《陕西省志·知识产权志》已经报送终审;省军区、省交通厅、省人大承编的军事志、公路志、水运志、人民代表大会志初稿基本形成;省科技厅、审计厅、计生委等单位的志书编纂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其他启动单位如省物价局、体育局、信访局等也相继成立了编纂委员会,并抽调了专门人员开展二轮修志工作。

199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志书“每 20 年左右续修一次”。2006 年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重申了“每二十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现在我

省多数单位已到了编修二轮志书的时限,而且都动了起来。按照《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规划》,临潼区政府及时启动二轮修志工作,说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对二轮修志工作是高度重视的,相信这次会议对二轮区志的编纂工作发挥较大的促进作用。

临潼是以秦兵马俑和骊山风景名胜区著称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自汉至唐地近京畿,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自明代至清末的 540 余年间已修志 7 部,有编史修志、传承文明的光荣传统。上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修志工作迅速展开,临潼也闻风而起,1982 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1983 年正式启动,经 6 年艰苦努力,于 1991 年 8 月完成编纂并出版,这在全省都是比较早的。新编《临潼县志》指导思想明确、体例合理、内容系统全面、资料丰富翔实,文字达 180 余万,内容能够体现时代特点和临潼地方特色,是比较成功的一部志书,1993 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今天召开全区第二轮修志动员大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二轮《临潼区志》所要记述的时段,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这 30 年的时间里,临潼经

●特 载●

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由渭南所属到西安所辖,再到撤县设区,各项事业与日俱新,许多行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就。继承和发扬首轮修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下大力抓好各项工作,再修出一部名志佳作,忠实地记录这30年来的变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地方志作为为党为国为民立言的重要历史传承,它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论著,希望大家在编纂工作中注意以下几方面:一要充分认识编纂《临潼区志》工作的重要性。修志是对历史的总结,是对前期所做工作的全面梳理,既能保存资料,又对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所以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二要广泛搜集资料,认真消化内容,为编纂工作打牢基础。编写志书从头到尾都是用事实资料说话,没有资料写不成志书;资料贫乏或低劣,就写不出精良的志书。因此资料搜集要求是“广、全、多、深、特”。三要严把志书的质量关,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原则。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是关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要结合各地实际,认真研读和总结第一轮修志经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每一位编

纂人员都要以科学认真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始终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四要不断加强学习,研读历史。参与编纂的每一位同志要认真分析研究临潼区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善于捕捉时代特点、挖掘地方特色,努力编修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同志们,从事地方志工作是一项既艰辛又艰苦的事情,也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要为承担起《临潼区志》的编纂任务而感到自豪,要树立起决心和信心,要守得住清贫,要耐得住寂寞,要坚持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如何正确对待地方志工作,如何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我想以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赠与大家并共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后,希望临潼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一如既往地支持修志工作,为《临潼区志》编修工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支撑。期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二轮《临潼区志》早日问世,成为县区志中的精品!

谢谢大家!

杜预长安逆石鉴

公元 265 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是为西晋武帝。不久,晋武帝派杜预统兵灭吴,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杜预(222~284 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长安区东杜陵)人。西晋著名军事家和史学家。

杜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晋武帝泰始年间守河南尹。其时,司隶校尉石鉴为安西将军,驻长安。石鉴与杜预因有宿怨,故奏请武帝免去其河南尹之职。恰逢西北匈奴寇陇右,石鉴欲借刀杀人,遂奏请以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 300,骑百匹,让他出击匈奴。杜预从洛阳赴长安,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杜预回至长安,石鉴逼他立即出击。杜预经过调查,看到匈奴兵势强盛,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立即出击不利。故提出意见:“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他把自己的用兵方略概括为“五不可”、“四不须”,向石鉴陈述。石鉴大怒,上奏朝廷,说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留止军用物资,贻误军机。于是,杜预被押回,送交廷尉审治。然而实



践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陇右之事的发展全如杜预的预料。匈奴帅刘猛举兵发动叛乱,武帝命令杜预以散侯身份参谋军国大事。不久,升任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杜预忠于职守,向晋武帝提出过 50 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都被采纳。

杜预为官多谋略,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他力赞伐吴,晋军主帅羊祜去世后,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到任后,杜预征伐民工,兴修水利,众庶赖之,人称“杜父”。太康元年(280 年),率兵伐吴,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凯旋回师后,因杜预功勋卓著,晋爵为当阳县侯。他“结交接物,恭而有礼,向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便潜心注释经籍,自谓“左传癖”。所著《春秋左氏传集解》,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解。

酈道元 遇难阴盘驿



酈道元(? ~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

酈道元一生热爱自然,献身科学,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好学博览,以前人《水经》为纲,通过搜集丰富的文献和实地“访渎搜渠”,撰成《水经注》40卷,详细注录了全国1250多条大小河流的走向和经过,对水道沿途的山陵、城邑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建筑名胜和民间传说等,作了生动的叙述,是一部兼有文学和史学价值的地理名著。然而,酈道元个人的结局却是不幸的。

史载,酈道元“为政严酷”、“执法清刻”,因而深遭北魏豪强以至皇族的忌恨。特别是在他任御史中尉期间,秉法公正而严猛,“权豪始颇惮之”。孝昌三年(527年),雍州刺史萧宝寅在长安发动叛乱,平时忌恨酈道元的豪强、皇族

为了借刀杀人,就怂恿孝明帝任命酈道元为“关右大使”,前去说服萧宝寅归顺朝廷。酈道元明知这是政敌的阴谋,但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欣然前往。当他同随行人员途经阴盘(今临潼东)驿的时候,萧宝寅以为“来者不善”,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派行台郎中郭子帙率兵,将酈道元一行包围于驿亭。该驿亭地处一高冈上,无水,酈道元命令就地打井,打了10余丈深仍不见水。水尽力屈,郭子帙等越墙而入,刺杀了酈道元及其一个弟弟、两个儿子。《北史·酈道元传》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可见酈道元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临死也没向萧宝寅之流屈服。

酈道元死后,“宝寅犹遣敛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至于具体葬在长安城东的什么地方,史无记载,难得而知。



毛泽东 在延安的故事

支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及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各个方面和修养的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它们所应采取的态度。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的内容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所以请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章。刘少奇把文章写好后交张闻天。按照当时《解放》周刊的工作惯例,凡是重要文章都先送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打破常规,用最短的时间很快就看完了,立即退给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他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

篇很有用的文章,应当快些发表。编辑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发排付印,在《解放》周刊第81—84期上刊出,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党中央规定了22篇学习文件,毛泽东曾亲自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干部必读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篇。该文章1943年被正式编入解放出版社的《整风文献》。

未实现的毛蒋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起草复电周恩来:“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



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定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

去时间。”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毛蒋终未实现谈判。

中央准备搬迁到淮阴清江浦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等等,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不遗余力地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政协的协议也是真诚地准备付诸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准备南迁清江浦(淮阴)的问题。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后来梁漱溟回忆说,在访延安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是,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中央准备南迁清江浦的拟议也就取消了。

王泰吉(1906~1934),字仲祥。陕西临潼人。1912年入小学读书,后又读3年私塾,1921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5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营排长。1926年春任陕军甄寿珊部教导营学兵队队长、第一营营长,负责中共雨金(军队)特别支部工作。1928年4月率该营官兵近300人起义,寡不敌众而失败。王脱险后参加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在河南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时被捕,始终未暴露身份,后被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杨虎城出面具保获释,并任其参谋。1930年王任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随杨虎城部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先后任新兵训练处处长、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职。1933年7月21日王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起义部队共约2000余人。后部队被打散,王率百余人突出重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与李妙斋、习仲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是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任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入秋后,王等率部在陕甘边境开展游击斗争,先攻取了枸邑



王泰吉

(今旬邑)县城,接着北进甘肃合水。11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部队整编后进军南梁,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约100华里的红色根据地。

1934年1月,王与警卫员化装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行经淳化县通润镇,被其老相识、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而遭逮捕,被押解西安,南京政府严令“处决”。

王泰吉大义凛然,在狱中墙上写下“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的诗句,并写有松绝命诗桦和松绝命词桦。是年3月3日,王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

1951年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修建了王泰吉纪念亭、纪念碑。

党的地下联络站——莲湖食堂

□ 封五昌

1935年,党中央在西安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负责同志有徐彬如、宋绮云、杨明轩,主要负责人是《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同志。

创刊于1931年的《西北文化日报》,原是国民党政府潼关行营的机关刊物,后由杨虎城将军接管,遂成为十七路军机关报。杨即任命宋绮云总揽社务。《西北文化日报》社址原在五味十字安徽会馆,后来迁移至北大街(今人民剧院斜对面)。这期间,“西北特支”利用《西北文化日报》作为公开宣传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党中央当时交给“西北特支”的主要任务是除领导中央苏、鲁、豫、皖特委和皖南游击队外,着重是做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西北特支”为了掩护他们进行秘密接头或开展外围工作活动,决定在西安开设一个饭馆,由宋绮云请求杨虎城予以帮助。杨指示尧山中学校董兼尧山油厂经理张永敷拨出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仍以宋绮云等人集股名义对外。集资的有杨虎城将军的部下王根僧、王子厚、童陵生、金闽生等人。饭馆位于莲湖公园东南角,取名莲湖食堂,

主要经营西餐。

食堂经理是蒋自明同志,属党外进步人士。他是江苏铜山县人,此前曾在陇海铁路管理局当徒工,长于西餐烹饪。食堂经营了几年,颇为顺利。后来,蒋自明同志按照党组织意图,扩大业务范围,以便更好地发挥地下联络站的作用,改名“百乐饭店”,并迁址至北大街通济坊西口的通济大厦,增设中餐部、冷饮部、旅馆部。饭店后院通有后门,便于秘密活动。蒋自明同志经营有方,每次党所交给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因此,我党在西安的多次会议,都在百乐饭店召开。平时,党的领导同志及社会进步人士(如杨明轩、杜斌丞、南汉宸、李敷仁等),也常借在此就餐进行碰头接洽。最难忘的是1938年初,毛泽民和钱希筠同志,因有特殊任务(党派毛泽民赴新疆工作)路过西安时,由宋绮云、邵幼和同志妥善安排,在此秘密下榻,安全无恙。直至蒋自明同志1945年5月10日患脑溢血病逝(一说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致死),党所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站——莲湖食堂(百乐饭店)也随之结束。莲湖食堂存在近十年之久,为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左宗棠 收复新疆二三事

左宗棠的一生中,最辉煌的部分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新疆。这一使命始于 1875 年春天,那年的 5 月 3 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在此之前,关于新疆问题,清廷重臣李鸿章与左宗棠有分歧。

与李鸿章有分歧

收复 160 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是在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的叛乱后,那时的大清是乾隆皇帝的时代。乾隆好大喜功,把这片领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片领土自汉代就隶属中国。

1867 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企图瓜分西北。从此,清廷失去了对这 160 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实际控制力。

1875 年的一日早朝,李鸿章向慈禧太后上奏:“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有不同见解:“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在左宗棠看来,一枪不发,便将大片膏腴之地拱手让给别人,这是他难以容忍的。面对内忧外患,他一马当先,而且面对“兵疲、饷绌、粮乏、运艰”的难题,他仍信心百倍。慈禧太后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带着林则徐当年绘制的新疆地

图出发了,他要去兰州做出征的准备。

强将手下无弱兵

一个叫穆图善的满人,本来带着部队驻扎在安西和玉门一带,负责接应前方。但这支部队沾染了不少恶习,偷窃掳掠,样样都在行。左宗棠知道后,向朝廷上奏说,心中不知为民,作战不知为国,私心杂念太重,这样的部队出关,有害无益;而且玉门、安西粮草不足,这样一批人到那里坐食,是不应该容许的。请求把部队遣回。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穆图善不高兴,他直接上奏朝廷,表示要留在关外效力,由他来执行新疆军务。奏疏中,他很不服气地说,不要以为猫才会捉老鼠,猫头鹰也会的。慈禧在奏疏上批示说:“世上多养猫制鼠,尚无养猫头鹰防鼠者,著穆军退关内,新疆军务勿庸插手。”

左宗棠作风强硬,撤换了一些不称职、不听指挥的满人将领。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收复新疆大业之所以能完成,肯定不是左氏一人之功,他手下有很多得力干将。

金顺是汉人,奉左宗棠之命刚到新疆,就

和乌鲁木齐都统、满人景濂发生了摩擦。二人冲突的起因在于粮食——金顺有兵无粮,景濂有粮无兵。景濂认为金顺来后,可能自己的都统位置不保,于是就开始找碴:

“你的军粮带来没有?”

“没有。”

“没有吃什么?”

“左帅爷叫我领兵来打仗,没有叫我运粮来,这里没有存粮吗?”“有,但是我的部队要吃。”

“这里有多少部队?”

“有三十四营。”

“既然如此我请示帅爷回京,在没有得到命令以前,请你供应。”“不可能。”

“大帅是钦差大臣,照理你也该归他指挥。”

“你凭什么说这话,我和他都是朝



廷命官,都统听命于军机处,左宗棠是陕甘总督,我与他风马牛不相干。”

话说到这里,再也进行不下去了,金顺派人快马加鞭去肃州,向左宗棠报告情况,请求处理。左宗棠得报后,认为又是一个满官,既然不肯听命,就上奏说:“景濂有粮无兵,金顺有兵无粮,互相争执,必须调出一人,统一指挥,请撤一人,并把部队汰弱留强,重新整编,以利于战斗。”

朝廷很快批复,让乌鲁木齐都统景濂回京,金顺继任。

在景濂就要交权回京之际,他遇上了麻烦,向金顺移交时,金顺说:

“对不起,你还不能离开这里。”

“为什么?”

“名册上你有三十四营兵,我实点只有十七营,其他一半,上哪儿去了?交清再走吧!”

“我历来只有这么多兵,朝廷知道,称三十四营是习惯相传。”

“我不是三岁小孩,少来这一套。你要是平常领十七营的饷粮,我不提这个,但你领的是三十四营的饷粮,我怎能少接一半兵,就让你走呢?”

景濂无言以对,但仍瞪大眼睛威胁说:

“你要怎么办?”

“我要你交足三十四营兵,你交不

出来,我要上报。”

见来硬的不行,景濂软了下来:“老兄!你我在这苦寒地方,实在太差劲了。你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以后你照我做,也有好处。”

“对不起,我不是满人,不敢做这种非法的事情,我家有老母,还等我送葬呢。”

最后,金顺把景濂多吃饷银的事报给左宗棠,左宗棠派人将景濂押解回京。

乔家大院鼎力助军

在新疆打仗,人烟稀少,粮食和运输问题是新疆用兵的首要难题。

左宗棠谆谆告诫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的头等大事,今后作战的利钝迟速,完全决定于这两件事情的办好与否。至于买粮一事,须精确弄清马、步实有数,哪天到哪里,到地方有吃的外,还要准备几天的裹粮。一路一处,都要事先备好,少买不足供食,多买又成累赘。转运当中,部队打起仗来,变动很大,如果专依赖人背人挑,百姓太苦,必须要设法军驮,才能顶事。”

左宗棠考虑得细心周详,通过多个渠道,粮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除了粮运,军费也是战时一个重要因素。

电视剧《乔家大院》一度在央视热播,乔致庸家喻户晓,在真实的历史中,乔致庸,这个山西票号(下转第 21 页)

国歌歌词从废止被取代到恢复的历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它已深深地铭记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每当重大庆典或其他隆重场合唱着它的时候，爱国主义的情怀和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然而，就是这首庄严、雄伟、深刻、字字珠玑的国歌歌词，在“文革”中却遭到禁唱，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又被取代，直到1982年12月才恢复原貌。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是著名戏剧家田汉于1935年2月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人民音乐家聂耳谱曲。因其表达了千百万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

1949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北平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9月25日，毛泽东、



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了筹备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的意见。在讨论国歌时，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在群众中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有一部分委员虽然基本上赞成，但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他们认为，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而现在形势变了，要对歌词进行修改；有的委员说：“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周恩来支持采用原歌词，不同意修改，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最后，毛泽东拍板，决定原歌词不改动，仍然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起到唤起人们居安思危的作用。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

●史料钩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66年2月,江青及其同伙把一大批老作家、老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也把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关“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1966年12月,田汉被捕入狱。1968年12月10日,田汉含冤惨死于狱中。

田汉被打倒之后,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可是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并举行多次讨论会,一首新的国歌歌词终于产生,内容如下:

前进!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 前进! 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 16 -

新国歌歌词被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于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为了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还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文章说明了新国歌歌词征集过程,对新歌词逐句进行了诠释,阐明新歌词的政治意义。但是,新歌词的内容虽然很“革命”,却不受群众的欢迎,甚至连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会唱,许多人说“不对味”,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新歌词一直流传不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田汉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提出,鉴于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所作的国歌歌词也应予以恢复。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至此,国歌歌词也如同它的作者田汉一样,经历坎坷曲折的命运后,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地位,并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



西安古城墙之 引水渠道与排水渠道

为了解决西安城护城河的水源和城市生活供水，五代宋金元及明清时期，先后疏通了原城东郊的龙首渠，并新开凿了城西南郊的通济渠，引水入城，排注于壕。同时，为了解决城市排水问题，明代时期又修了余公渠。

龙首渠 龙首渠，西安城引水渠道之一。始凿于隋开皇三年(583年)。此渠引流泾水，从秦沟村处堰水北流，至长乐坡分为二渠，东渠从长安通化门北上，绕郭城东北角，入于大明宫。西渠从通化门处入城，分注兴庆池、东市放生池及宫城东海池，为长安东城地区的主要供水渠道。但此西渠，至五代后期逐渐干涸不通，府城居民饮用惟靠井水，护城河也是有壕无水。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九月，永兴府(今西安)知府陈

尧咨以府城井泉大半咸苦，居民不堪饮食，遂上奏宋真宗，请求疏凿龙首渠西渠，引泾水入城并灌注护城河。其奏疏云：“州臣亲相度城东二里有水渠曰龙首，其水清冷甘冽，可五六十丈，开渠引注入城，散流麇阓，出纳城壕，阖城尽食甘水。”(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渠》)

陈尧咨在疏引龙首渠泾水入城的同时，循唐旧迹，在城东支分龙首渠水南注于兴庆池，使五代时因龙首渠断流而逐渐干涸的兴庆池，又恢复成为水波荡漾游人如织的风景名胜之地。庆历(1014—1048)时曾于池北立《宋兴庆池禊宴诗碑》。宋人宋舜钦有《兴庆池》诗：“余润涨龙渠，疏溜连清浚。助晓远昏山，浮秋明刮眼。鱼归别浦闲，雁下苍波晚。岸北有高台，离魂荡无限。”

金代时期,龙首渠入城及灌注城壕之水未断,时兴庆池仍支分渠水入注。天眷(1138—1140)时,京兆知府张仲孚还在兴庆池北修有众乐堂与流杯亭,曲水流觞,日与宾客宴游其中。

元代初期,为解决护城河的水源与府城的引水,极为重视龙首渠西渠的疏浚。至元元年(1264年),陕西行省平章赛典赤瞻思丁赴任即疏浚龙首渠西渠及其支道。《类编长安志·渠》龙首渠条载:“至元甲子,赛平章复引水入城中。至元十年,复开五季后涸渠,自长乐坡西北流入王城(安西王府城),一渠西流,灌兴庆池,经胜业坊入城,经少府、钱监、都水监、青莲堂、西入熙熙台(在府城西北隅),西入城壕。”即通贯于府城的东西,最后西出排注为护城河的水源。

明初,由于西安城区向东、北两面的扩广,护城壕的继掘延长,以及城区之内诸王府与各衙署新的部署,增加了城市供水的需要,因而在府城拓建工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毕工后,立即对龙首渠进行了重新规划疏治。《明史·河渠志六》:洪武“十二年,李文忠言:‘陕西病咸卤,请穿渠城中,遥引龙首渠东注。’从其清,甃以石”。《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月二十四日,明太祖“诏修西安城中水渠,引龙首渠水注之,覆以石甃,以障尘

秽。计十家作渠口一,以便汲水。旧西安城中多苦水,渠成民获其利”。但西安城仅此龙首渠一脉之水,只能流注东城区,且代运物迁,堤倚高原,日见削损。七八十年后,水源艰难,城中军民多于晨昏争汲,汰清而后可用。天顺(1457—1464)时曾图修治龙首渠,因费用过巨,难成而止。成代元年(1465年),陕西巡抚项忠在从城西新凿通济渠的同时,并疏凿了龙首渠。《明史·项忠传》:“西安水泉卤不可饮,为开龙首渠及浣河,引水入城。”项忠这次疏凿久湮废的龙首渠达三十余里,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整治。首先将引水口由原马登空(今有人认为在秦沟村)南移到留公村附近,合采峪、库峪、荆峪及大义谷第一派入浣之水,傍浣河西岸筑堰,西至亭子头,皆凿原穿洞而过,又西流申家湾,再西流十里入城。其次,渠水入城后,在流经咸宁县与总府(在今东县门街)前二十丈,渠道皆以砖甃砌,余虽土渠,也都以板木棚盖,以土覆之,用以防护。弘治(1488—1505)时,陕西巡抚周季麟与西安知府马炳然再次疏浚整治龙首渠。凡城内渠道,俱用砖甃砌。在城外申家湾等处,造桥架槽引水入渠,以免冲激之患,并对城外六十里土渠疏浚后筑岸加固,以防走泄。

经明代多次疏凿整治后的龙首渠,

从府城东长乐门之南引水入城后,分为三派:一派从玄真观南流,经阳王府(在今建国路)南西流,转东羊市,过咸宁县、总府西流,支分一水入永兴王府(在今钟楼东南),转北过马巷口(今降子巷附近),沿北大街北上,分为两支:一支北流入阳王府(在今北城门内东侧),一支西北流注于莲花池(今莲湖公园);一派从真武庵(在今东门内南侧和平巷附近)北流,注入长乐门北杨大人宅;一派从东羊市分流,沿大菜市(今大差市)北流,分为两支:一支西北流入临潼王府(今尚德路中段路东),一支西流入秦王府城。

清代时期对龙首渠也进行过多次疏浚,而护城河注水渠向发生了变化。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疏浚龙首、通济二渠。康熙以后,龙首渠亭子头以下故道湮塞。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西巡抚鄂弼修筑西安城,将渠水入城水门废弃,自此龙首、通济二渠之流都不能入城(通济渠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再次导引入城),仅能分注于东、西城壕,故乾隆四十年(1775年)陕西巡抚毕沅虽疏浚二渠,亦是为灌注城壕。〔嘉庆〕《咸宁县志·地理》:“今通济渠入西城壕,而龙首则自灌田外入东郭冰窖,余者注东城壕,而渠自此绝矣。”此后,道光五年(1825年)陕西巡抚卢坤、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军同知王诤都是因城壕干涸而疏浚龙首渠的。

通济渠 通济渠,明清西安城引水渠道之一。开凿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此渠是陕西巡抚项忠与西安知府余子俊为解决西安西城区供水与东城壕的水源而开凿。《明史·河渠志六》载项忠奏言:“西安城西井泉咸苦,饮者辄病。龙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筑不易,且利止及城东。西南河去城一舍(古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许,可凿,令引水与龙首渠会,则居民尽利。”

洩河,发源于今长安区申店乡,灃河北侧,西北流,经西安城西南丈八沟,过三桥镇,北注于渭河。项忠所奏凿的通济渠,从府城西南丈八沟设闸遏水,引洩水北上,自闸北西行二里折而北流,过丈八头小石桥,又北至南窑头,又北过甘家寨,又东北过糜家桥、解家村,又北至西安外城郭,再至安定门吊桥,城外渠道二十六里。然后经洞口入瓮城南流,出瓮城水门外,沿城而南,过一敌楼,复入城,东南流至白鹭湾,折而东北流,至梁家牌楼南,又东流入于地下砖渠,再分为三派分流:一派自长安县署(今西大街城隍庙东)东流过广济街,沿西大街、东大街之南东流,过大菜市(今大差市)、真武庵出城,注灌于东城壕。沿途所过,支分渠水,分注于按察司(在

今西大街市公安局处)、永寿王府(在今竹笆市东永寿巷),布政司(在今钟楼西南粮道巷西)、保安王府(在今钟楼东北隅)及秦王府城;一派从西大街广济街北流,过迎祥观(今北广济街南口东)而西,过永丰仓(在今庙后街西仓)前,西入贡院(在今西大街西段北侧儿童公园);一派从广济街直北而上,过麻家什字,汇入莲花池(今莲湖公园)。成化时开凿的通济渠,入城后渠道用砖甃砌一千五百五十丈,合4960米。弘治(1488—1505)间,陕西巡抚周季麟与西安知府马炳然对通济渠城内尚未砌而有损坏的渠道,以砖甃砌七百二十丈,合2304米,并对城外土渠亦加疏浚修筑二十五里。为了城内居民饮水卫生,周季麟令沿通济、龙首两渠所过每十家作一井口,以砖为栏,以瓷为口,以板为盖,启闭以时。

清代时期,对通济渠进行过多次疏浚。由于明末战乱,通济渠湮塞不通。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与长安知县梁禹甸、咸宁知县黄鼎修浚通济渠。康熙六年(1667年)重修。不久渠道又多湮塞。雍正(1723—1735)时通济渠城内三派水渠,仅自广济街北经永丰仓前入于贡院一流畅通,其向东注入东城壕之渠自广济街东淤塞,自广济街向北汇入莲花池一流也淤塞不通。乾隆二年

(1737年),陕西巡抚崔纪行重加疏浚。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西巡抚鄂弼修葺西安城墙时,将入城水门废弃,自此通济,龙首二渠之水不复入城,而仅能分灌于城壕,并改变分注方向。龙首渠原先灌注西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东城壕。通济渠原先灌注东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西城壕。乾隆四十年(1775年)巡抚毕沅、道光五年(1825年)西安知府叶世倬曾多次疏浚通济渠,多是为了放水入西城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陕西巡抚魏光燾疏浚通济渠,并在西门吊桥南设火药局、置水碾,再次引水入城,经贡院,复东北流,入注于莲花池。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又疏浚通济渠城内外渠道,“导水自西门入,曲达街巷,绕护行宫,便民汲引。城外近渠民田,兼可灌溉。并浚城壕,引水环焉”(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考下》)。

余公渠 余公渠为明清西安城的泄水渠。明英宗天顺(1457~1464)年间西安知府余子俊主持开凿。《明史·余子俊传》载:“子俊知西安时,以居民患水泉咸苦,凿渠引城西漓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无所泄。至是,乃于城西北开渠泄水,使经汉故城达渭,公私益便,号余公渠。”这条泄水渠,似为今天西安继续延用的汉城东侧北流入渭的泄水渠。

端履门

□ 彭栋为

从新城广场南行,穿过东大街,有一个醒目的路牌——端履门。

端履门,也称端礼门。顾名思义,即端正服履,端正礼仪,以准备朝拜君王,接受召见的

意思。端履门最初得名,可推至明朝初年。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智略平定天下,建立明朝。鉴于关中和西安的战略地位。朱元璋果断封其地位仅次于太子

的次子朱棣为秦王,令人营建秦王府(即今新城)。洪武十一年(1378年),王城告竣,秦王入城主政。王府城设四门,东曰体仁,西名遵义,南称端礼,北叫广智。南门端礼,清顺治时被改称端履,相沿至今。明、清时,每天早晨,天尚不大亮,王侯以下的大小官员,便早早地赶到这里,忙着正冠整衣,然后毕恭毕敬地垂手站立,等待王府传唤。与此相关,在此街的北端东面,还有一个小巷,名叫朝贺巷,也即晋见秦王之官员,于此准备朝贺之意。端履门南接碑林博物馆,北连东大街,如今已是繁华热闹的商业文化区。

(上接第14页)的龙头老大,还是当时左宗棠筹措军费的东家。

乔致庸很会做生意,左宗棠西征时,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军费急缺时,乔家票号还会为左宗棠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也都是由乔家票号提供的。这次回京,左宗棠与乔致庸还有过一次会面。因为乔家所在山西祁县位于川陕至京城的官道上,左宗

棠在途经祁县时,特地拜访了乔致庸。来到乔宅,左宗棠见到乔致庸的第一句话就是“亮大哥(乔致庸,人称‘亮财主’),久仰了”,这使后者受宠若惊。左宗棠一再感谢乔家的鼎力相助,称在西北能够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乔致庸还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执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

用一年时间,左宗棠收复新疆,这场胜利,被认为是晚清对外战争中的唯一一场胜仗。



汉武帝与周至

□ 卫哲夫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历史上的第六位皇帝,以杰出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垂范青史。在他执政的 54 年期间,曾多次游幸周至,为周至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厚度,现让我们透过泛黄的纸页,拨开两千多年的烟云尘雾,将有关史迹记述如下:

一、少年天子,射猎田园

汉武帝刘彻于景帝后元元年(前 141 年)登上皇帝宝座,年仅 16 岁,因招来一帮儒生商议改历,立明堂、易服色等事,遭到了一生“不悦儒术”,信奉黄老的窦太后的反对,这位瞎眼祖母不时的干预朝政,牵制孙儿的政治权力,使得这位娃娃皇帝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便终日陷入郁郁寡欢之中,加上皇宫单调沉闷的生活使他时感寂寞。于是自建元元年(前 138 年)开始,这位 19 岁的少年天子在处理完政事之余,便经常换上平民服装,私自出游,“北至池阳(今

陕西泾阳),西至黄山(黄山宫,兴平县东南),南猎长杨(长杨宫,位于我县城东 15 公里处竹园头村,因有垂杨数亩,故名),东游宜春(宜春宫,西安市东南)”。

武帝跟侍从中善于骑射者,约定在殿外,夜间出发,对外谎称是他的姐夫平阳侯,天明赶至终南山麓,“射鹿豕狐兔,驰鹜禾稼之地”,这种无法无天的扰民行为,招致了老百姓的极度反感,“民皆呼号詈骂”。一次他们行至柏谷(今河南灵宝)投宿民间客栈时,被店主人“疑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要不是聪明的老板娘从中解救,几乎险遭不测。地方政府也几次出兵围捕,迫使随从们不得不亮出皇帝信物,才得以放行。

这以后,刘彻为了安全起见,便不在民间客栈投宿,在各处私设更衣(旅舍)12 所,不及投宿旅舍时,便住在周至县长杨、五柞二宫,更增加了来往周

至的频度。

二、听不知检, 扩建上林苑

这一切仍不能满足刘彻对享乐的追求,“上以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为由,又决定扩建久已荒废的上林苑。

上林苑为秦都咸阳时置,汉初荒废。汉武帝命令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吾丘,复姓,吾音 yù)登记阿城(阿房宫)以南,周至以东,宜春(西安市东南)以西,调查田亩总数,估其价值,准备全部划入上林苑,使其可以直达终南山。建成后,在苑内放养珍禽异兽,种植奇花异卉,供射猎游乐之用。

在这座供皇室贵胄、文武大臣游乐饮宴的苑囿内,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居于其中的。经汉武帝的一纸诏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全部离乡背井,被迁徙到遥远的西方边陲——河西(今宁夏)戍边,上林苑成了无居民、无村庄的森严禁区。

工程正在筹建,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东方朔上疏,在列举了治上林可能引起的种种弊端之后以“殷作九市之宫(殷纣王在他的皇宫中,设置九市,做起生意)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台(楚灵王在国内修筑章华台,显示豪华)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宫而天下乱”为谏。刘彻认为东方朔说得有道理,擢升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可以出入皇宫),赐黄金百斤,但并未停止上林苑的兴建。苑成,东起蓝田,西到周至黑河以东,南止秦岭,

北濒渭河。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极言其宏大、壮丽、奢华。

其中,长杨宫始建于秦昭王,此时刘彻又予以扩建重修,又在附近建五柞宫(有五株巨大柞树遮盖数亩)、葡萄宫(在今九峰附近,以引种张骞通西域时带回葡萄命名),彼此相距不过数里,相映生辉。这些宫殿都是西汉皇朝离宫(皇宫以外的宫室),是刘彻及其皇族近臣在汉长安城郊外办公和休憩的处所,不难想象,当时刘彻所作出的抗击匈奴,削平地方各封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政令决策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后来,刘彻病危离世时不在长安城而住周至五柞宫,可见,这块热土在汉武帝心中情结之深。



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豪华宫苑,要维持正常运转,无疑需要不菲的经费支持。汉武帝指使部下在苑中就地取材,兴办各种产业,“以苑养苑”。据《汉宫仪》记载:“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贖不满五千者,徙置苑中,人日五钱,从事蚕桑、纺织、铸钱、百工、陶皿工、营竹……”以终南镇为中心,竹园头、司竹、斑竹园一带竹器具作坊比比皆是,冶铁业及铁器制造作坊星罗棋布。这些经营活动,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上林苑的日常开支之外,朝廷额外得到了70亿钱,汉武帝把它用作攻击西域的军费。

三、阳刚尽显,长杨宫击熊

当时,刘彻二十左右年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据《周至县志》和《周至大事记》记载,在长杨宫射熊观狩猎时,曾创下下一日击熊三十六只的记录。有次,司马相

如随行,见刘彻以万乘之尊亲履险境,认为这是随时可能丧生的冒险,不以为然,遂上书规劝:“今陛下好陵险阻,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二人均为古时的猛士)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臣窃以为陛下不取。”刘彻大悦,但行为依然如故。

一千九百多年后的清乾隆年间,任周至县令的邹儒凭吊射熊馆遗址时,做诗一首:“曾闻高馆势凌空,武帝登临亲射熊。我欲乘车问古迹,满郊禾黍动秋风。”

四、开凿灵轺渠,发展周至水利事业

周至地处西汉京畿附近,上林苑的兴建使皇家贵族云集,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刘彻十分看重土地肥美、产品富饶的周至农业,十分重视兴修周至的水利事业,于建元六年下诏开凿了一条著名的灵轺渠,这条渠自今周至与眉县交界的灵轺原下引水,流经周至、户县,蜿蜒曲折,最后注入地处今长安县斗门镇,当时为汉政府训练水军的昆明湖,堪称是历史上最早的从周至引水到西安的工程。灵轺渠的开凿,使我县沿河两



岸的大片土地得到灌溉，使百姓受益，客观上促进了周至农业的发展。

五、改内史为三辅，始置整屋县

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周至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被西汉政府正式确立为一个县，开始有了自己的建置，有了它自己的名字——“整屋”。

这件大事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此时的西汉在政治上已逐渐抛弃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定于一尊，西汉儒学的主要内容，除了先秦儒家的“仁义”之外，还兼采了阴阳家神化封建君权的学说，用阴阳五行来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儒生们极力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主张改制，刘彻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命令太史令司马迁与射姓、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共造太初历(三统历，也称邓平历)，于公元前 104 年宣布改制，以黄色作为汉王朝的象征，以“五”作为祥瑞数字(例如政府大印印文不足五字者，要设法补足)，重新改写官名，厘定政府或皇家用的音乐，再制定政府祭祀用的礼仪，采用以正月为首的夏历，改内史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在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整屋县因之应运而生。

考周至历史沿革，源远流长。远的不用说，有汉以来，先属于中地郡，继之归左内史，汉武帝建元元年(前 135 年)又归属右内史，但始终未有过独立的县

制。

新置的整屋县，治所在今天终南镇东一里，处当时上林苑中，属右扶风管辖。建县的初衷是为了对上林苑内部从事各种工作的工匠和服劳役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县名因终南的山水屈曲蜿蜒的地理形胜而得名。经历过两千余年的沧桑风云，朝代更替，整屋的建置、县名尽管有过兴废，治所、辖地也曾有过几多变迁，但现在还是以汉武帝时的命名，叫响于华夏大地。

六、亲赴楼观，谒祀老子

后元元年(前 88 年)汉武帝亲临周至楼观，在老子讲授《道德经》的地方，跪下九五之尊的躯体，向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作虔诚的拜谒。此时，道教还未创立，老子也还未被神秘的光环所笼罩，而汉武帝刘彻以自己的雄才大略，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使西汉王朝专制的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巩固，疆土扩展，经济繁荣，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已年届七十，且又百病缠身的老人做出如此的举动呢？

我想，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人到垂暮之年是最喜回顾往事的，西汉开国之初，为了医治战争留下来的创伤，使人民休养生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把老子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筭

路蓝缕的开创，才有了后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抚今追昔，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无疑对这位伟大思想家产生了些许敬仰。

其次，刘彻晚年为了永远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希图长生不老，向往成仙登天，不断的举行“封禅”（祭祀天地），亲赴缙氏城（今河南省偃师县缙氏镇）等候东莱山（今山东掖县）可能要出现的神仙，派遣方士去深山大海求神怪，采芝药，并大作楼台而等候神人。但均无效验，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而老子是古代养生大家，汉代已有“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的传说，他去楼观谒祀老子，可能也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无奈之举吧。

刘彻不但举行了谒祀活动，而且建望仙台于楼观台北，并增置道员，扩建庙宇，修筑殿坛，尽显天子气派，可见对老子的虔敬之深。

七、临终托孤，病逝五柞宫

谒祀老子的第二年（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已病入膏肓，处于生命最后关头的刘彻又一次踏上了周至的土地，住五柞宫。在这里，他指定了自己身后的继承人（太子），并为辅佐太子作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史称“汉武帝五柞宫托孤”，它确定了汉武帝之后的政治走向，的确称得上是决定西汉政权前途与命运的大事。



本来，刘彻早已封卫子夫生下的皇子刘据为太子，但是，由于武帝晚年乖戾自是，疑神疑鬼，反复无常，轻信奸佞，加上皇族内部波诡云谲的派系斗争，致使刘据在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事件中遭受诬陷，被逼举行武装叛乱而兵败自杀，以后，围绕着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至为复杂，许多高层人物都卷入其中而被杀。

在所有的皇子中立谁为太子，怎样实现皇权的平稳交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存续，是武帝晚年日夜悬心的大事。他选中了钩弋夫人所生下的“形体高大多智”的刘弗陵，意欲立为太子，因其年稚母少，恐女主独居骄蹇，重演汉高祖死后，吕后篡权乱政故事，便着手做了

两件事,一是让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送给“为人忠厚,沉静详审”的奉国都尉霍光,曲折地表明了让他将来辅佐幼主的心迹。二是果断地处死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从根本上杜绝了将来可能引起乱政的后患,完成了权力交接的第一步。

关于“五柞宫托孤”,《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的:

汉武帝病情危重,霍光流着眼泪问:“陛下如有万一,当由谁继嗣?”武帝答:“你难道还不明白朕以前送你周公画像的意思?立我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帝,卿行周公之事。”霍光低头逊让道:“臣不如金日(mi)磾(di)。”金日磾答道:“臣是一个外国人,而且由我辅政,会使匈奴轻看中国。”

二月十二,汉武帝下诏,立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二月十三日,汉武帝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石单当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当左将军,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又任搜粮都尉桑弘羊当御史大夫,4人都在刘彻病床前宣誓就职。

在受遗诏的四人中,霍光是以抗击匈奴而出名的霍去病的异母弟,因为人忠厚可靠而步步升迁,官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宫则陪同刘彻乘车,入宫则侍奉刘彻左右,任职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过失。金日石单原为匈奴休屠国(位于今甘肃民勤县)太子,“人高马大,

膂力过人,骑射精绝,”被俘后,被罚作宫中奴婢,刘彻因其忠实勤勉而赐予“金”姓。上官桀以勇力著称,二十年来默默无闻,都对刘彻忠心耿耿。桑弘羊是洛阳商人出身,“言利事析秋毫”,在全国范围实行均输平准政策,统一调整国内的各种运输,平衡市场物价,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实力,是不可多得的经济专家。他们都为刘彻所信爱,“故特举之,授以后事”。

二月十四日,在位五十四年的汉武帝在五柞宫病逝。

刘彻逝世后,刘弗陵(汉昭帝)继位,未发生任何社会动乱,皇权的平稳过渡顺利完成。汉昭帝在霍光、金日石单、上官桀、桑弘羊四位元老重臣的辅佐下继续执行汉武帝在“轮台悔过”后的既定方针,继续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政策,保持了西汉政权的强大昌盛。

两千多年过去了,汉武帝刘彻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人物。上林苑、长杨宫、五柞宫、葡萄宫的风光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斑斑点点,些许陈迹。但是,每当我们驱车经过终南、尚村、集贤、九峰时,面对着车窗外碧绿的庄稼地,果实累累的猕猴桃园,商贾云集的集镇和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还是能读出周至大地昔日的辉煌,汉武帝仿佛距离我们那样近,他在周至的事迹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颂。



(富小云 整理)

西安同盛祥牛羊肉泡馍

“提起长安城,常忆羊羹名”,这是古人对长安(今西安)美食的留恋,如今有“不品尝牛羊肉泡馍就不算到西安”之喻,这是今人对长安美食的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喜气洋洋”,是对陕西人的生动写照。

关于牛羊肉泡馍的来历,有多个版本,说法不一。本文选其中两种说法:一说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唐朝军队与借来的“大食”军队一道平息了“安史之乱”。在唐王朝天子的恩准下,部分“大食”士兵被获准驻兵长安。“大食”兵行军打仗时常携带一种叫“饣尔木”的类似“饣”的食品,行军打仗旷日持久,士兵携带的“饣尔木”常变干变硬难以下咽,他们就用羊肉汤泡着吃,这就是“泡馍”的雏形。随着“大食”兵和当地人的交往日甚,“饣尔木”的制作方法

也从军营传播到市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今天的“饣饣馍”。一千多年来,经过西安坊上穆斯林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泡馍”已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成为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

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赵匡胤未得志时,生活贫困,流落长安(今西安市)街头。一天,身上只剩下两块干馍,因干硬无法下咽。恰好,路边有一羊肉铺正在煮羊肉,他便去恳求给一碗羊肉汤,以便把馍泡软再吃。店主见其可怜,让他把馍掰碎,浇给了一勺滚烫的羊肉汤泡了泡。赵匡胤接过泡好的馍,大口吃了起来,吃得他全身发热,头上冒汗,饥寒全消。十年后,也就是公元 960 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成为北宋

的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一次出巡长安,路经当年那家羊肉铺,香气四溢,不禁想起十年前吃羊肉汤泡馍的情形,便令停车,命店主做一碗羊肉汤泡馍。店主一下慌了手脚,店内不卖馍,用什么泡呢?忙叫妻子赶快烙几个饼。待饼烙好,店主一看是死(未发酵)面的,又不太熟,担心皇帝吃了生病,便只好把馍掰得碎碎的,浇上羊肉汤又煮了煮,放上几大片羊肉,精心配好调料,然后端给皇上。赵匡胤吃后大加赞赏,便命随从赐银百两。此事不胫而走,传遍长安。于是来店吃羊肉汤泡馍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就形成长安的独特风味小吃。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曾有“陇馔有熊腊,秦烹惟羊羹”的赞美诗句。

牛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要求很严,煮肉的工艺也特别讲究。这牛羊肉是精选的,肉和骨头要分开。煮时先煮骨头,



将骨头置清水锅里大火炖煮,两个小时后起浮沫,撇净后,先放旧调料袋提味,然后再下肉块炖煮,最后换上新的调料袋加味。以肉板压实加盖,武火烧溢,嘭嘭作响。再后,文火炖一宿。一觉醒来,满屋醇香,起床看汤鲜味浓,其色如奶,料香扑鼻;而肉则瘦肉绵软,肥肉不腻,不带一点膻腥。牛羊肉泡用的馍则是特制的,十分之九面粉,十分之一酵面。掺和、搅匀、揉到。做馍胚二两一个边起棱,下釜烘烤。

说是牛羊肉泡馍,其实是煮馍。煮馍有相当的技术,火候不好不行,汤与馍的比例不恰当不行。泡馍以烹调方法分为干泡(无汤)、口汤(食后余一口汤)、水围城(汤较多)和单走儿(吃馍喝汤)四种。且以馍定汤,以汤调料,武火急煮,适时装碗。那口汤,吃到底,碗里只有一口汤。干泡,碗内无汤。水围城,碗内周围是汤,中间是馍。吃泡馍时,将馍掰碎成黄豆般大小放入碗内,然后交厨师在碗里放一定量的熟肉、原汤,并配以白菜丝、蒜苗(或葱末)、木耳、黄花、粉丝以及料酒、盐、味精等调料,单勺制作而成。食时选定方位,讲究蚕食,切忌搅动,以保持鲜味和原气。若再佐以辣酱、糖蒜,则别有一番风味。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召开

2009年9月28日上午,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部分委员聚集一堂,共同研讨《〈西安市志〉(1991—2010)篇目大纲》,这是新一届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亚伟首先介绍了各位专家、教授的情况。在听取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关于我市地方志编纂工作情况汇报后,与会专家围绕《〈西安市志〉(1991—2010)篇目大纲》纷纷发言,内容涉及志书的体例、规范,我市二

轮志书篇目大纲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专家们重点就二轮志书如何体现西安市情、时代特色进行讨论,比如是否应该将“改革开放”单列,如何记述西安的开发区、新兴服务业、会展业、物流业的发展等问题。

市政府副秘书长郭艳文指出,修志工作很重要、很光荣,大家责任重大,召开类似的研讨会很有必要,希望通过讨论,进一步完善《〈西安市志〉(1991—2010)篇目大纲》,为下一步的工作打好基础,修出精品佳志。

西安同盛祥饭庄始建于1920年,至今已近90年,它是一家民族餐饮企业,以制作牛羊肉泡馍著称。同盛祥饭庄牛羊肉泡馍的特点是“料重味醇、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口味纯正”,它从选料到制作有着一套完整而严格的操作流程,工艺十分讲究。所以,同盛祥饭庄牛羊肉泡馍是西安惟一获得国家最高奖项“金鼎奖”的风味小吃,被公认为“陕西十大文化符号”之一。同

盛祥饭庄是西安清真餐饮界第一家走出潼关,与北京饭店合作于1991年在长安街台基场口开设分店的企业。“羊羹美味尝,惟属同盛祥”则是今人对同盛祥饭庄牛羊肉泡馍由衷的赞叹。

同盛祥“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不仅是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2007年5月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则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8月11日至12日,临潼区第二轮修志工作动员暨修志干部培训会在临潼宾馆召开。省志办主任刘培仓,市志办主任孙亚伟,区委副书记张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三民,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吴昌育,区人大副主任张东江,区政协副主席任继志,副区长林娣等领导出席会议,区级各部门、乡镇街道和驻临单位的主要领导和修志干部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吴昌育主持。副区长林娣宣读了《关于调整西安市临潼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三民宣读了《西安市临潼区第

临潼区召开第二轮修志工作动员暨培训会

临潼区地方志办公室

二轮修志编纂规划》和《〈临潼区志〉(1988~2010)编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区委副书记张炜作题为《明确职责,狠抓落实,认真做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动员讲话。副区长林娣受区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庞阿平委托与各承编单位签订了《第二轮修志工作目标责任书》。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在动员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他对临潼区委、区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表示感谢。他说,临潼区第二轮修志工作动员会规格高、规模大、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开得很成功。希望临潼区认真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西安市地方志管理办法》,把质量意识、有效措施贯穿到整个编纂工作中,求实、求新、求精,积极开拓创新,体现特色,打造精品,在二轮修志工作中编纂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这方热土的佳作。

《魅力高陵》样书制作完成

□ 张宏纪 张宁

为了充分展示高陵深厚的人文底蕴,向外界宣传高陵特色的风土人情、地域特产,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10年来高陵县发展变化的巨大成果,按照高陵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由高陵县地方志办办公室负责编纂的大型图片专集《魅力高陵》目前已完成设计排版,样书制作完成,交送有关领导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在审查之中,将于9月份公开出版发行。

《魅力高陵》共分12个乐

章,分别是:(1)高陵有约;(2)自然地理;(3)规划蓝图;(4)亲切关怀;(5)闪光荣誉;(6)历史回眸;(7)个性高陵;(8)人文高陵;(9)辉煌成就;(10)一日千里;(11)民俗文化;(12)地方特产。

《魅力高陵》整书采用现代视觉艺术设计,主要为彩版图片,并配有文字说明。整体设计力求展现综合性、历史性、现实性、艺术性、民俗性为一体,最终使之成为向外展示高陵的综合型靓丽名片。

《泾渭分明映清廉》编纂进入终审

□ 张宏纪 张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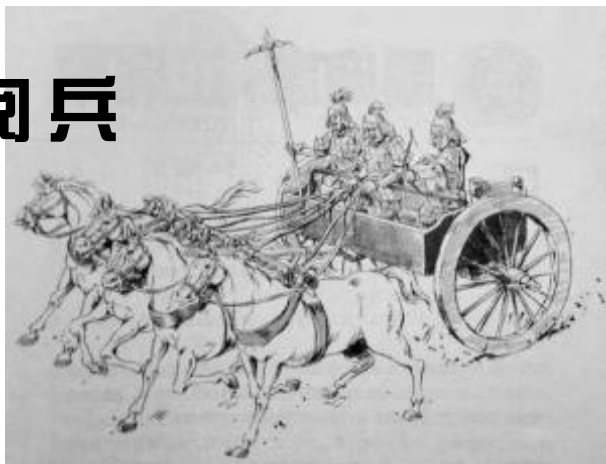
本着古为今用,资政育人,展现高陵清廉文化源远流长的目的,由高陵县纪委和高陵县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编纂的大型历史廉政人物专著《泾渭分明映清廉》已进入终审阶段,计划9月完成样书制作,报经编委会及县委、县政府审查后,公开出版发行。

《泾渭分明映清廉》一书,以全新视角、全新创意展现高陵廉政人文古今一脉,代代相传的历史古韵。本书精选108名与高陵有关的廉洁官吏事迹,运

用中国传统画的手法,绘制模拟肖像画,生动地再现了他们清廉的人格魅力。

《泾渭分明映清廉》的编纂出版,不仅是对高陵县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更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历史文化工程。既是对高陵历史的回顾,也是对高陵干部的鼓励和鞭策;既是对外投资形象的宣传,又是对高陵干部的教诲与告诫。

中国古代的阅兵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阅兵发生在距今 4000 多年前夏朝建立的前夕。当时,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为了向江南发展,曾在现今河南省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在那次盛会上,士兵们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载歌载舞,这不仅是一种祭天的仪式,同时还欣喜地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南方各部落首领的热烈欢迎。

到了春秋时期,阅兵活动开始频繁起来。最初的阅兵是以打猎方式进行的。军队列好阵势,最高统治者或长官在阵前先用弓箭射猎禽兽,然后检阅部队。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叫作“搜”(意为春天里打猎)。以后,又发展为定期检阅军队或战车。检阅步兵每年一次称作“搜”,检阅战车三年一次称作“大阅”,检阅步兵和战车五年一次称作“大搜”。

封建统治者如此定期阅兵,其用意除了检查兵员装备情况外,主要还在于向百姓示威。如春秋时晋文公认为“民未知礼(威仪),未生其恭”,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另外,还有在战前或战斗间隙进行的不定期的阅兵,称“观兵”或“观师”。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在战前鼓

舞士气外,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向敌方示威。

阅兵这一名称,准确地说是从汉代才被正式叫起来的。在汉代,定期的阅兵活动常与立秋之日的“祭兽”活动一起进行,其中还要增加一些打斗的内容。以后,各个建朝时间较长的朝代都有类似汉代定期或不定期的阅兵活动。

清代时,按清朝典制,皇帝每三年在南苑举行一次大阅兵礼。清代宫廷画家金昆等人奉命所绘的《大阅图》共分为“幸营”、“列阵”、“阅阵”和“行阵”四卷。真实描绘了乾隆帝亲临军营检阅的盛况。尤其是《阅阵》,图中所画人物不少于 1.6 万人,每个人都面貌分明,衣着装饰,车马枪炮,仪仗旗鼓等均描绘精细,画面用色艳丽鲜明,乾隆被绘于画面的核心位置,穿盔带甲,全副戎装,骑于马上,英姿勃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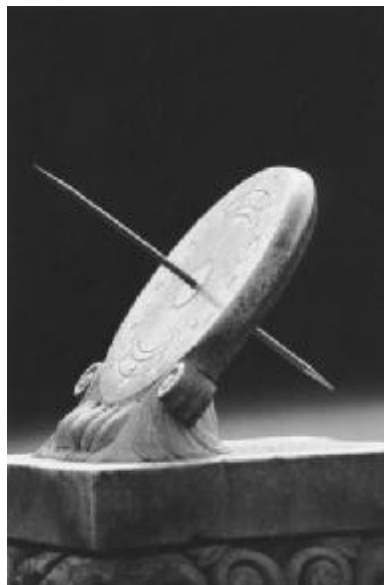
阅兵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感荣光、最感振奋、最为神圣庄严的盛典。

孔子曾以貌取人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当年孔子聚徒讲学,门下有许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宰予的学生,平时能说会道,能言善辩,说话很讨人喜欢。宰予刚开始给孔子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孔子觉得他很机灵,很能干,但相处时间长了,孔子发现他既无仁德又十分懒惰,待人不真诚,为人很虚伪,靠耍嘴皮子蒙人,常常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且,学习不用功,白天不读书听讲,时常躺在床上睡大觉。尽管孔子多次对他进行帮助说教,但他总是不能改正。为此,孔子很失望,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字子羽,鲁国人。子羽体态和相貌都很丑陋。初次见面,孔子凭主观印象觉得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但是,子羽是个很用功也很谦虚的学生,他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不走歪门邪道,而且总是远离那些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后来,子羽游历到长江流域,跟随他的弟子有 300 多人。由于德艺双馨,声誉很高,各诸侯国都传诵他的名字。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想到以前对他的误解,禁不住感慨万分,深刻反省自己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 34 -



成语和古代天文历法

天文历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年、月、日、时、节气的安排,还包括日、月、行星的运动、交食、晷影、漏刻、恒星出没、天空分区等。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少成语就是从中演化出来的。

1、昼夜时辰

古人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 12 个时段,即夜半、鸡鸣、昧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夜

半三更”指深夜时光。“鸡鸣而起”形容勤奋不怠。“日中必彗”是说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将东西拿出来晒,比喻做事要抓紧良机。“日中则昃”常比喻事物盛极则衰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日昃忘食”形容专心致志,孜孜不懈。日出又叫“朝”、“旦”、“早”、“晨”,日入又叫“暮”、“夕”、“晚”、“昏”“昏”“昏”。相关的成语不胜枚举,如朝三暮四、朝令夕改、晨兴夜寐、早出晚归、昏定晨省、宵衣旰食等。

2、天干地支

古人还利用天干地支来纪年。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顺序寅在卯前,成语“寅吃卯粮”就比喻经济困难,入不敷出。“丁是丁,卯是卯”是说干支不能搞错,形容办事认真,一点不马虎。“甲子之年”指60岁的年纪。“更”是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古人把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更长梦短”形容思虑不安,彻夜难眠。“更阑人静”指深夜一片寂静。

3、日月运行

古代历法中“朔”指农历每月的

第一天,“晦”指每月的最后一天。因而用“朝菌不知晦朔”形容寿命短。中秋、重阳等都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时月亮最圆、最明、最美,“月过中秋”就指错过好时机。重阳节是赏菊花的最好时日,“明日黄花”就比喻过时的事物。

“圭臬”是古人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根据日影的长短可以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长短。“奉为圭臬”是说把某些言论或事物当作衡量正误的准则。一般人凭生活常识目测日光,“日上三竿”是说太阳升起来离地已有3根竹竿那么高,多形容人起床晚,时间不早了。“晷”



是古代观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后指日影。“焚膏继晷”就形容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或用功读书。“漏壶”是古代滴水计时的工具,内盛以水,均匀地向下滴,有刻度计时,也叫漏刻,简称漏,成语“漏尽更深”就指更深之时,“更长漏永”形容漫长的夜晚。

4、星斗推移

古人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了 28 组,叫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成语“南箕北斗”是说当箕、斗二宿同时出现在天空时,箕在南,斗在北,后常用来比喻有名无实。因为“箕”是星宿,不能用来簸扬,“斗”也是星宿,不能用来舀酒浆。“斗转参横”是说北斗转了向,参宿横斜,表示天色将明。“斗转星移”是说星斗位置发生变化,表示时序变迁或指时间的推移。

5、天象变化

古人还注意到了虹霓、流星、月盈月亏、日月食等天象。出现云霓,就预示着下雨,“大旱望云霓”形容盼望殷切。流星飞快地划过夜空,就用“星驰电发”

形容做事快捷。“流星赶月”比喻彼此追逐,行动迅速。月亮到最圆后就开始缺损,就用“月盈则食”比喻事盛则衰,物极必反。“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比喻事情发生前的征兆。“月眉星眼”形容女子容貌美丽。“日月交食”比喻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太阳东升西落,日出处叫“东隅”,日落处叫“桑榆”、“西山”,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比喻这个方面失败了,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日薄西山”就比喻事物接近衰亡或人近老年。

6、天人合一

古人往往把观测到的天象与人事结合起来。日月同时升起,在我国少见,因而古人以成语“日月合璧”附会为国家祥瑞。古人称月上弦逐渐盈满为“恒”,就用“日升月恒”比喻兴旺。“日东月西”比喻远隔难逢。“日月参辰”比喻离别不得相见或相互不和。“动如参商”是说参商二星此出彼没,不同时出现在天空,因以比喻人分离后不能会面。古时认为泰山为五岳之首,北斗星在众星中最亮,就常用“泰山北斗”比喻众所敬仰的人物。“斗重山齐”是说像北斗星一样令人景仰,形容人德高望重,才学出众。



明君畏史笔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多数是能秉笔直书的。不少善于自律的君主都怕做了坏事被史官记上一笔,遗臭万年。

北魏孝文帝是贤明君主,他以古代圣贤为法,约束自己。他对史官说:“时事不可以不直笔书写。人君掌握大权,作威作福,在己一人,不受他人制约。如果他有过失,史册不照直写来,那他就会肆无忌惮,任意胡为。”

唐太宗也是明君。有一次,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兼管起居注,记录我的言行。记录可给我看吗?”褚遂良答道:“史官记载人君的言行,善恶皆录,这样人君才不敢为非作歹,没听说人君可以自取观看的。”太宗又问:“朕做了坏事,你也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

洎插嘴说道:“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士也会记的。”太宗点头称是。

后来,太宗又问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历代史官所记,为何都不让人君自己观看?”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人主看了如实的记载,必然发怒,所以不敢呈献。”太宗道:“朕的用心与前朝的帝王不同。我想亲自观看国史,以便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您可陆续将国史呈给我看。”谏议大夫朱子奢谏道:“陛下圣明,没有过失,史官所述,多是好事。陛下独览起居注,于事无失。不过,如果此法传开,后世做皇帝的子孙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

帝王无所惧,也怕春秋笔。如此看来,真实的报道,正直的评论,公平的史笔,是制约特权的重要方法之一。



范仲淹选官： “一家哭”与“一路哭”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朝廷为了推行新政,整顿吏治,要选派一批官员到各路去担任监司。“路”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称,相当于后来的省。“监司”管辖一方,不仅权力大,责任也十分重大。因此,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非常重视监司的选拔擢用,对监司名单一一审查,毫不留情地把不才者一一勾掉。

这时,同他一起负责审查名单的大臣富弼,看见范仲淹勾之甚多,心里不忍,就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意思是:“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就轻易地去掉了一个人的乌纱帽,哪知这一来就要害得人家一家子哭鼻子呢。”

对富弼的劝说,范仲淹不为所动,

他严肃地反问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说的是罢黜一名不称职的官员不过使他一家为之哭泣,怎比得上一个地区的老百姓遭受其涂炭呢?换句话说,假使不让这一家子哭,听任贪官污吏留在台上作威作福,他们治下的百姓必然遭殃,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痛哭。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一笔勾之”看似轻易,实则不然。当时,北宋王朝官僚机构臃肿,官数无限膨胀(达到 2 万余员),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为了谋取差事,特别是谋取显赫的职位,许多官员不择手段,致使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处在这种积重难返的官场生态环境下,端掉那些贪官庸官的乌纱帽,势必触犯朝廷内外

毛泽东论秀才

对于秀才,毛泽东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他仍看重秀才的重要作用,他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影响权贵显宦和 护宽容,不姑息养奸,不忧谗畏讥,不怕
皇亲国戚的既得利益,必然招致他们的 阴风浊浪,不怕得罪权贵。他用一句话
反对和围攻。在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虎 表达了自己的磊落胸襟:“公罪不可无,
视眈眈面前,范仲淹敢于说“不”,不庇 私罪不可有。”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的一大品类。立翻领,对襟。前襟共五颗纽扣。上下对称共四个口袋,带盖和扣子。袖口各有三颗纽扣。下身是西裤。因伟大的

中山装的政治含义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完善了中山装造型,并赋予政治含义。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前襟五颗纽扣代表“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理想;而袖口三颗纽扣则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封闭式翻领,显示了严谨治国的理念。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

何谓郡望和堂号

“郡望”和“堂号”,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是区分同一姓氏不同地域和识别亲疏的主要依据,也是寻根问祖,追源溯流的基本线索。在较为正规的族谱中,往往在姓氏前面冠以郡望(地望),在姓氏之后标明堂号,使人一看便知该姓氏的起源发祥、支派族别的基本脉络。因而郡望、堂号是研究姓氏文化,查证家世渊源必备的基本常识。

有些家族由于世代居住某地,人才辈出,被加官晋爵,荫及后世,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文化威望,成为当地的豪门大族,

这种家族在当地被人仰望,称郡望。一般小姓有一到几个郡望,大姓则郡望较多。郡望成为家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也是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据。堂号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支的称号。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几代同堂,或同一姓氏的分支、分房集中居住某一处或相近几处厅堂、宅院之中,堂号成为同姓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供奉祖先,在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号,成为区分一个家族源流世系以及族属、支派的标记。

何谓“孺子牛”

在古代，“孺子”是指小孩子的，不分性别都称孺子，尤其是指幼儿。“孺子牛”最早是出自《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有个小儿子名叫荼，齐景公非常溺爱他。有一次，齐景公和荼在一起嬉戏，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口里衔根绳子，扮着牛的样子，让小儿子骑着、牵着玩花样。不料，小儿子一不小心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

齐景公临死前遗命立荼为国君。景公死后，荼继承了王位。但是陈僖子要立公子阳生，并在齐国大臣田乞协助下阳生篡位，将荼流放后害死。在拥立新主的时候，齐景公的大臣鲍牧对陈僖子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

背之也！”鲍牧的意思是，陈僖子你忘了君王给荼做孺子牛的时候折断牙齿的事了吗？今天你违背了先王的遗命啊！从这个典故来看，那时“孺子牛”的原意是表示父母对子女的过分疼爱。

后来现代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名句使孺子牛的精神得到升华和拓展，而后人们用“孺子牛”来比喻心甘情愿为人民群众服务，无私奉献的人。



“留学生”一词的由来

“留学生”这个词是由古代日本创造的。唐朝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因是外交使节，驻唐时间一般不过一两年，不能在中国久留，因而无法满足日本全面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的需要。为此，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起，便加派“还学生”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是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留学生”则是遣唐使等回国

后，仍然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的学生。当时留学生在唐朝主要学习哲学、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等。现在日本的京都建筑式样几乎同唐朝的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之名，这都是留学生的功绩。从那时起，“留学生”这个词就一直沿用下来。现在凡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都称“留学生”，“留学”一词也就由此而产生。

古人的别号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称谓有名、字和号。号，在古代社会作为个人的一种称谓，不受场合、对象的限制，经常取代名和字，成为人们交往时的称呼。

古代的一些士大夫们以及文人墨客在名、字之外，还有自己起的一种称呼。因这种自称有别于父母或长辈起的名和字，且与名

和字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故称别号，亦称自号。但古人自起别号，也绝非随意，而是蕴含着特定的寓意或内涵。

古人别号的类型很多，有的取自自己的书斋，有的取自自己的居所或地望（即籍贯或故乡），有的表现自己的情趣和爱好，也有的是表现自己的志向、追求和理想。

在古人自起的各种号中，以自己书房（斋）为号的现象较多。如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在任刑部、兵部主事时，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龙场（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驿丞。他到龙场后，曾在县城北的龙岗山山腰处的天然洞中，筑室读书，并改名为“阳明小洞天”，亦称“阳明洞”。之后，他便以“阳明先生”为号。明代书画家徐渭也因其书斋名为“青藤书

屋”，而自号“青藤道士”。又如小说家冯梦龙的别号“墨憨斋主人”，是取名自己的书斋“墨憨斋”。明代学者、书法家黄道周的自号“石斋”，则是因其曾于漳浦县铜山所（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的铜山岛上垒石为室，在此读书的缘故。

有的古人则是以自己的居所为号。如唐代诗人杜甫曾居住在汉宣帝的陵园

“少陵”附近，遂自号“少陵野老”。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洛阳城郊的寺庙“香山寺”居住过，故以“香山”为号，自称“香山居士”。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住在湖南衡阳的石船山，遂自号“船山”。

在这类的别号中，也有以祖籍或故乡为号的。如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祖籍山西涑水乡，遂自号“涑水先生”。同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因其家乡在昆山亭林镇，则以“亭林”为号。

在古人的别号中，有许多是表现自己的情趣和爱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此号之意在其《六一居士传》中有解释：“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

此五物之间,岂不为‘六一’乎?”其号中就体现了欧阳修的幽默和风趣。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元丰年间,因被人指责做诗讥讽朝政,而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轼没有居所,只得住在庙里与僧众一起生活。之后在故友的帮助下,他才得到黄州城东门外一处已经荒弃的营地。苏轼便在这里垦荒种地,还建了一所十分简陋的居室,起名为“雪堂”。因这里位于黄州城东,又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东坡”为号,自称“东坡居士”。古人自称“居士”者,多含隐居不仕,或自命清高之意。苏轼虽然官场失意,生活穷困潦倒,但从他的自号里依然可以感受到苏轼的情趣所在。

古人的别号中,还有一些是表现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深感朝廷无心恢复中原,忧世愤俗,而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便以“放翁”为号,以示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认为人的一生应该勤奋,像稼穡一样,“以力田为先”。因此他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稼轩”,并以此为号。以此勉励自己在学业和事业上勤奋、努力。

被誉为清初画坛“四僧”之一的画家朱耷,是明江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明朝灭亡以后,面对国毁家亡的现实,

朱耷极度悲愤,曾落发为僧。晚年又以“八大山人”为号,并一直用到去世。他自号“八大山人”,仅从字义上,是感受不到其中的寓意的。但只要看到他在自己所绘作品和上面的署名,就不难理解它的寓意。

明朝灭亡后,他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朝合作。他创作的绘画作品,往往采用象征的手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他所绘山水,多表现荒凉萧瑟,残山剩水的景象。实际是朱耷寄情于画,用作画表达对明王朝的留恋。在他笔下画出的鱼、鸭、鸟等动物,则常把眼睛画成方形,眸子点在眼眶边,给人以白眼朝天之感,其间又充满倔强之气。这种表现手法,正是朱耷心理的写照。而朱耷在署名时,又将“八大”和“山人”连写。“八大”二字似“哭”字,又似“笑”字;“山人”二字则似“之”字。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意“哭笑不得”,以此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至于古人别号的数量,是没有限定的。有的人一生往往不止一个别号,可有数个,十余个,甚至更多的别号。如朱耷除“八大山人”外,还有雪个、个山、屋驴、人屋等别号。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医学家、书法家傅山(青主)就有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斋庐、侨黄、侨松等三十余个别号。

『先生』的演变

历史上各个时期，“先生”这个称呼的对象是有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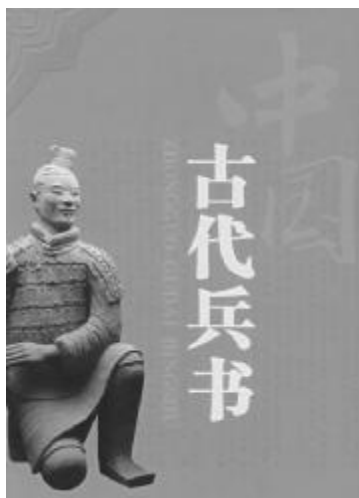
《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注解：“先生，父兄也。”又，《孟子》：“先生何为出此言也？”这一“先生”是指长辈而有学问的人。到了战国时代，《国策》：“卫客患之，乃见梧下先生。”《国策·秦策》：“先生坐，何至于此？”均是称呼有德行的长辈。第一个用“先生”称呼老

师的，始见于《曲礼》：“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注：“先生，老人教学者。”今称老师为“先生”，本此。汉代，“先生”前有加上一个“老”字的。清初，称相国为老先生，到了乾隆以后，官场中已少用老先生这个称呼了。辛亥革命以后，老先生这个称呼又盛行起来。交际场中，彼此见面，对老成的人，都一律称呼为老先生。

“不管三七二十一”溯源

战国时，苏秦主张合纵抗秦，张仪主张连横事秦。一次，苏秦到了齐国都城临淄，见到了齐宣王，对他进行游说抗秦。齐宣王谈到齐国的兵力不足时，苏秦说，都城临淄有七万户，我私自计算了一下，每户按三个男子服役，这就是三七二十一万兵，抗秦的兵源，用不着再往别处征兵，仅临淄一城，便绰绰有余了。苏秦的这个算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全城不可能达到每户都

出三个男子当兵，因为这里面有鳏夫、寡妇，有的人家只有女孩没有男儿。即使男子，也不一定都能从军，因为还有老、幼、病、残在内。苏秦的算法是即兴蒙一下齐宣王，达到说服对方、鼓舞对方的目的。后来，人们就把“三七二十一”作为讥讽的贬义词来相传，并且在含义上有所扩展，成了不问是非情由、不分青红皂白、蛮干、愣头青的同义俗语而应用在社会生活方面了。



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为春秋末孙武所作，共 82 篇，图 9 卷。今存本 13 篇，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的推崇。

《孙臆兵法》：亦称《齐孙子》，为战国时齐国孙臆所作，共 89 篇，图 4 卷。隋以前失传，1972 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

《吴子》：由吴起、魏文侯、魏武侯辑录，共 48 篇，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 6 篇，都系后人所撰。

《六韬》：传说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作。后经研究，定为是战国时的作品，现存 6 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尉缭子》：传说为战国时尉缭所作，共 31 篇，今存有 5 卷，共 24 篇。

《司马法》：春秋时司马穰苴撰，计 3 卷。穰苴姓田，齐景公时因功封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齐威王时命人重新整理，共 150 篇，今存 5 篇，主讲军事理论。

《太白阴经》：由唐代李筌撰写。共 10 卷。《四库全书》收录的 8 卷本，是后人合作的。

《虎铃经》：由宋代许洞撰写，全

书 20 卷，共 120 篇，内容主要发挥《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观点。

《纪效新书》：亦称《纪效》，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共 18 卷，每篇都各附图说。卷首有《或问篇》作为总序，是一本练兵和作战经验的总结。

《练兵实纪》：由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正集 9 卷，附杂集 6 卷，此书和《纪效新书》亦称戚氏兵书姐妹篇。



“润笔”的由来

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非说不可时,称之为“阿堵物”,意思是“那个东西”。稿费是近百年才有的新词,以前有个雅称叫“润笔”。《隋书·郑译传》有一则故事:郑译为皇上拟诏书,有人戏称他“笔干了”,郑答:“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以后把稿费、书画酬金称为“润笔”,即出此典。

当年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汉武帝读了受感动,陈皇后重新得宠,司马相如得黄金百斤。那时好像还没有润笔这个规矩,陈皇后是以向卓文君买酒的方式送黄金的,所以人们只好说是“作文受贿”。

润笔之风至唐大盛,最出名的是韩愈,专为名公巨卿写碑铭,“一字之价,犖金如山”;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诗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文人真是受

益不浅。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偁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做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



灞陵行送别

唐 李白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
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赏析】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于此，遂称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叠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

别气氛。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

“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时代著名诗人。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

●历代诗人咏长安●

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乃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多少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今日的西京,巍巍紫阙之上,日欲落而浮云生,景象黯淡。这也带有写实的成分,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

治原因。

由此看来,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理解了这种心情,对诗的结尾两句的内涵,也就有了较深切的体会。“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今夕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如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与其说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不如说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人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诗风飘逸,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十分丰满。

